

观点速览

刷屏时代，别让思考能力“碎成渣”

如今，不少人习惯了被手机“投喂”即食信息，既然可以接收现成的结论，何苦自己费神梳理信息、推敲逻辑？于是，大脑逐渐变得懒惰，深度思考的能力也在不知不觉中削弱。

但这样获取的信息，真的能为我们所用吗？

去年很火的一个词“脑腐”，就很形象地描绘了当代人在碎片化信息轰炸下的注意力涣散、语言表达贫瘠和思考浅薄等症状。长此以往，个人会逐渐失去深度思考能力，难以形成独立见解；在社会层面，当多数人思考力弱化，公共讨论也将流于表面，严重挤压理性对话空间。

如何把思考力从碎片化信息中“打捞”上来？

有人建议筛选信息来源，关注高质量、有价值的媒体和账号，主动走出算法视野；也有人通过物理手段“断舍离”，比如给自己设定“无手机日”，让自己摆脱信息干扰，重建深度思考的习惯与空间。这些都不失为有效的尝试。

除此之外，平台可以发挥关键作用。譬如，优化算法，减少低质娱乐内容推送；给予知识科普类内容流量扶持，鼓励创作者产出深度作品。

社会层面同样可以有所作为。不少城市、社区开展“书香节”“读书分享会”等活动，营造了浓厚的阅读氛围。主动“出击”、多方协同，方能在信息洪流中不被裹挟前行。

（6月16日 大洋网 皇甫思逸）

情感共鸣是数字时代的传播密码

当我们把视线转向更广阔的社会图景，会发现人格化传播正成为数字时代的一大传播特征。苏超得到迅速传播，与“城市人格矩阵”有着莫大的关系。徐州队凭借场均抢断数领先联盟32%的数据被赋予“淮海硬汉”的形象，苏州队以85%的传球成功率诠释了“园林绣花功夫”，甚至楚汉争霸的历史恩怨，这些带有鲜明人格标签的“梗”使得这场赛事迅速“出圈”。

央视的《主播说联播》栏目通过主持人接地气的语言、多元的表情体态，将严肃的新闻评论转化为拉家常式的沟通，实现了内容破圈与价值升华。

人格认同先于产品认同，情感共鸣重于功能说服。

李子柒视频中那个坚韧、宁静的东方女子形象，满足了都市人对田园牧歌的精神渴求；哈尔滨从老工业城市一跃而成为一个“讨好型市格”城市，城市治理能力就迅速转化为可感知的人情味，牢牢地锚定在游客记忆中。

人格化传播的本质，是人类在数字空间重建情感的圈层化连接，这些联结的出发点也许是“地域梗”，也许是艰苦卓绝的奋斗史，这些镌刻在我们基因的古老故事元素叠加真实、有温度的人格光辉就在算法的世界中重建了情感的绿洲。

（6月11日 光明网 光明网评论员）

政法报道中对未成年人的保护策略

□刘友旺

在政法新闻的报道中，关于涉未成年人案件报道是一项重点内容。未成年人案件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在涉及未成年人的政法新闻报道时，需在尊重新闻真实性的基础上，予以这一群体必要的关怀与照顾。

关注隐私保护,把握报道尺度

在报道关于未成年人的政法新闻时要注意隐私保护，不得过度披露当事人的隐私，否则会使涉罪未成年人出现严重的羞耻感，影响其后续回归社会。在报道时需要坚持“审慎”原则，把握好报道的尺度，将报道的重点置于引导和教育上，发挥出媒体的社会责任，在叙事内容方面需对犯罪细节以及当事人的个人信息进行模糊处理，科学选择素材，既要客观、公正地报道案件事实，也要提出解决方案，发挥出警示作用。

以“刘学州寻亲事件”系列报道为例，个别媒体在报道时出现了过度挖掘当事人隐私、采用单方信源等问题。从这类事件的报道来看，报道时需要保护好当事人的隐私，不得过分解读，而应以具体的议题出发为公众提供普法教育，引出公共性话题，如“怎样为未成年人提供正确的心理疏导”“如何建立科学的未成年人保护体系”等。总之，作为媒体，必须要坚守初心与使命，把握好报道的尺度。

组织公正报道,不得夸大事实

进入融媒体时代后，媒体之间的竞争变得更为激烈，这也导致一些政法新闻报道中出现了娱乐化倾向问题。真实是新闻报道的生命，在报道关于未成年人的政法新闻时需客观揭露新闻事实，新闻工作者不得将自己的主观评价代入报道，需从中立、客观的角度出发。有的新闻媒体报道时过分描述犯罪细节，不仅违背了新闻媒体的主流价值,也会使社会对涉罪未成年人产生歧视,这是非常不恰当的。在报道时需要关注新闻伦理,回归新闻报道本源,不得带有主观方面的倾向,更不能刻意夸大事实、渲染犯罪场面,不能进行哗众取宠的报道,不得使用评价式、定性式的报道话语,也不能出现“问题少年”“无教养”“不良少年”“坏孩子”等话语。

以2025年1月4日的《检察日报》为例，其在报道一起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时采用了故事模式、新闻模式、警示模式结合的叙事方式：“小谭将他人停放在车库的燃油摩托车盗走”“为罪错未成年人提供劳动研学实践、职业技能培训、教育引导等服务，促进其顺利回归社会”“小谭将在湿地公园开始为期一个月的志愿服务”……

报道通过多种叙事模式的结合，不仅剖析了案件真相，也起到了良好的警示教育功效，充分发挥出了媒体的正面宣传、

舆论引导作用。

增加叙事主体,优化叙事策略

政法新闻报道也需坚持“内容为王”，提升报道内容的深度。当前，全社会对于未成年人犯罪问题予以了高度关注，作为新闻工作者，需从报道的深度方面下功夫，能够透过现象看到本质。一方面，针对未成年人涉罪内容的报道需引入多元化的叙事主体,可从案件当事人、检察机关、公安机关、法院、知情人、专家学者等多个角度进行叙述,为受众提供丰富、全面的新闻信息,这也能够对新闻内容展开深入化、多角度的报道,使新闻报道更加可信。另一方面,需从多种叙事视角来阐述,使叙事更加清晰、吸引人。如在报道时也采用倒金字塔叙事形式,用简洁直观的方式为受众介绍案件基本信息,迅速吸引受众,在后续报道中再根据事件的发生与发展不断补充，丰富报道的整体脉络。

2024年初，山西省太原市晋源区人民检察院办理了一起未成年人盗窃案，山西一家媒体报道这起案件的手法就颇为得当。首先，对涉罪少年作化名处理，不透露身份信息，如：“独自在省城的小辉”。其次，淡化作案过程和手段，最后，着重报道“检察力量帮助‘迷路’孩子回家过年”，详细讲述检察机关耐心沟通帮助少年打开心结、心理疏导助力重拾生活信心、委托专业人士对父母开展家庭教育指

导等。报道通过多种叙事模式的结合，充分发挥出了正面宣传作用，不仅剖析了案件真相，也起到了一定的警示教育作用。

坚守法治精神,坚持无罪推定

政法新闻的报道也必须要坚守法律底线。从关于未成年人的相关报道来看，信息的过度披露多出现在侦查环节，但这一阶段案件还处于侦查阶段，犯罪事实尚未明确，犯罪嫌疑人是否真正有犯罪行为还是待定的，对于政法新闻媒体而言，报道时必须要坚持法治精神，坚守底线原则，避免出现“越位”行为。在报道时还需要坚持无罪推定，所选择的素材应当由侦查机关提供。另外，新闻工作者还需从全面化的视角看待问题，严格把好报道尺度，不能在侦查阶段就主观将人、案相连，需要将报道重心后移，拥有更多确切素材，有效降低报道侵权风险。

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是备受全社会关注的问题。进入融媒体时代后，新闻传播格局出现了显著变化，新闻传播速度显著加快，有的媒体为了提高点击率、抢占流量，未把握好未成年人案件报道的尺度，在社会上造成了不好的影响。主流新闻媒体需要坚守初心，在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基础上坚持报道高质量的新闻内容，关注新闻报道的人文关怀，切实发挥此类报道的正向教育作用。

（作者单位：太原日报社）

媒体融合时代,财经类出版社如何转型

□张熠婧

当前，新媒体技术发展迅速，对财经类专业出版构成一定的冲击。虽然财经类专业出版社具备一些不可替代的优势，但是在现实背景下，探寻与新媒体技术的深度融合是财经类专业出版社需要完成的必修课。

财经类专业出版社面临的现实困境

从某种意义上说，财经类专业图书出版市场是卖方市场，更关注内容的合理性、表达的标准性和规范性，这与互联网思维是截然不同的。互联网思维以读者需求为创作起点，根据读者的实际需求进行有针对性的创作，在选题策划和发行传播方面有大数据支撑。大数据能够获取读者阅读的相关信息，可构建清晰的财经读者画像，并据此向读者进行个性化推荐，这为内容生产提供了精准的创作方向。

传统的图书发行渠道多为各地新华书店和书商销售渠道。虽然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图书销售模式有所创新,如开设自己的网店,与京东、当当合作上架销售等。但是,以上这些销售模式都有一个共同问题,即均为消费者的自主选择行为。这与当前的主流营销模式,即为消费者主动推介还有一定的差距。财经类专业出版社如何最大化地发挥现有传播优势,走出一条财经类

专业出版社独有的传播之路还需要摸索。

媒体融合是财经类专业出版社的必然选择

新媒体技术是推动出版模式转变的重要引擎。数字出版平台可实现排版、编辑、设计多环节线上同步进行。同时，出版社还可利用电子平台的数据充分分析图书的市场需求，有侧重地进行选题和内容策划。

之前，读者主要靠阅读书籍获得线性信息，而现代的读者更倾向于串联型、生动的内容形式，这也为财经类专业出版社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以传统图书出版为基点，以网络、社交媒体、直播、视频号为抓手提供碎片化的知识服务，是财经类专业出版社不得不选择的媒体融合转型之路。同时，可在与读者互动的过程中敏锐察觉热点问题和读者的关注点，并基于此策划出版相应的图书，使新媒体平台成为读者与出版社交流的平台。

受限于专业发展空间，媒体融合是破解财经类专业出版社困境的必然选择。财经类网站、APP、公众号、抖音号等时时刻刻都在更新财经类新闻和观点，这已抢占了财经类专业出版社不少江山。在这种现实情况下，财经类专业出版社更应该建立自己的新媒体矩阵，并以新媒体矩阵链

接大众读者，绑定行业专家，形成媒体聚合、专业深度的权威出版矩阵。

财经类专业出版社转型发展路径与对策

构建出版内容生产新生态，设立媒体融合发展总体框架。内容资源是财经类专业出版社的核心资源，是进行媒体融合生产的关键。对于财经类专业出版社来说，业务内容主要包括专业出版和大众普及出版两类。这两类出版的特点、服务对象、知识体系是完全不同的，在进行媒体融合时的发展方向也不尽相同。专业出版方面，以知识服务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可建立专业数字图书馆、专业知识教育服务平台，为客户提供数字阅读、信息浏览、内容查阅等服务，并可以此为基础建立相关主题的社群、互动平台，不定期对相关主题内容进行更新，增强作者与读者的互动性和对出版社的黏性。大众普及出版方面，应以简单、快捷、易于接受为前提，结合专业知识普及的实际需要，形成产品矩阵，并可建立大众普及教育宣传平台，实现渗透式专业知识普及。

创新内容传播方式，构建新媒体传播矩阵。财经类专业出版社的优势在于高品质的专业内容，应充分利用新媒体模式，扩大传播范围、增强传播效力。要搭建好

自己的平台。如可在出版服务平台上设立行业发展动态专区，实时更新行业动态，将网站作为从业人员、学习人员图书阅读、知识更新的家园，也可在平台上结合热门图书设立图书讨论交流专区，为读者和作者提供互动平台。

还要充分利用好现有的新媒体平台资源和流量优势，扩大财经类专业出版社的宣传与影响力。应结合不同平台的特点制作与平台内容形式相匹配的新媒体内容并加强宣传与传播。以抖音直播平台为例，其内容呈现形式为直播和短视频。结合财经类专业出版社的实际，可创作财经热点问题知识短视频等，也可根据每本书的内容拍摄短视频进行宣传，还可根据热点问题、新闻延伸宣传销售图书。

创新业务发展形式，实现财经类专业出版社转型发展。专业服务的延展性从广度上可延长专业服务链条，增加用户黏性，如向学生提供实践课程网络课堂、职业发展规划指导、同步就业信息等。财经类专业出版社可借鉴凤凰出版传媒集团策划开发的“凤凰数字课堂”，从财经理论学习、财经专业实践、职业规划开发等领域进行深入开发。财经类专业出版社还可发挥多年积累的行业内专家资源和出版资源，建立行业智库，承接行业内的研究、咨询、培训业务等。

（作者单位：中国金融出版社）

一朵开在原野上的小花

——读赵霞作品《北斗在天》

□邹亮



童谣，是儿童文学最原始的文体，“谣”为“不用乐器伴奏的歌唱”。《诗经·魏风·园有桃》篇曰：“园有桃，其实之酸，心之忧矣，我歌且谣。”唱吟歌谣，重章复沓，忧时伤世。所以，明代杨慎谓童谣“以其出自胸臆，不由人教也”，这位被陈寅恪认为“才高学博、有明一代罕有其比”的大才子，不仅有“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这样豪迈沧桑之句，也有“豆子山，打瓦鼓。阳坪山，撒白雨。白雨下，娶龙女……我诵绵州歌，思乡心独苦。送君归，罗江浦”这样声情感人的童谣送别诗。

日前读到赵霞创作的儿歌集《北斗在天》（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2024年12月版），一股清新之气迎面扑来。城市化运动，似乎让我们这批在农村长大的孩

子失去了田野的记忆。小时候眼睛、耳朵、鼻子、味蕾的记忆还有吗？那些田野里的植物、瓜果的四季姿态和水边的鱼虾虫鸟的习性，你还能用文字活色生香地呈现出来吗？童年的我们，怕黑、怕鬼，晚上的月亮特别亮，照得人影长又长。“影子短，影子长，影子出门晒太阳。”（《影子》）童年的我们，上学的记忆最真切，放学路上观察虫鱼鸟兽，它们都是好朋友。“太阳上学，翻个山包。／鸟儿上学，飞过沙包。／蚯蚓上学，钻个土包。／小孩上学，背个书包。”（《上学谣》）“一只小鸭，嘎嘎嘎嘎，池塘底下，捉鱼捉虾。／两只小鸭，嘎嘎嘎嘎，青草地上，吃草吃花。……”（《小鸭》）孩童时代，夏天的夜晚最热闹，要在外面乘风凉，能听到各种声音。“蟋蟀弹琴，啦啦哩哩。甲虫敲敲，咚咚喵喵。灶鸡打拍，笃笃踢踢。有人一来，没声没息。”（《夏天的夜晚》）而《老家》分明是对童年故乡的怀念：“老家远，老家近，小溪转弯是

小径。／山青青，树青青，荷花菱花水中映。／红蜻蜓，蓝蜻蜓，外婆头上停一停。”

赵霞是“晓得俗歌里有许多可以供我们取法的风格与方法”，比如“起兴”的引用。“高高山，低低山，高高山上有只船，无桨也无帆。／低低山，高高山，低低山上有支箭，无弓也无弦。”（《飞船和火箭》）“高高山，低低山”是绍兴童谣中的起兴，古老的语调中融入了“飞船和箭”这一现代化的玩意儿，这得益于从小受到的诗教。《诗经》以国风居首，国风多用“兴”，“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兴”在外国诗中很少见，在中国民间的童谣与小调中却随处可见。赵霞在小区里散步，与儿子一起编念童谣：“哪了哪了，上树摘桃，摘了半瓢，听见狗咬，下来就跑……”“哪了哪了”是啥意思，说不上来。其实这也是一个起兴，就是制造一种氛围，是情感的铺垫。起兴与比兴不同：起兴作为引子营造氛围或激发联想，并不参与表达；比兴则通过比喻与象征传递深

层思想。

儿童歌谣是声韵的艺术。周作人《儿歌之研究》称：“盖儿歌重在音节，多随韵接合，义不相贯。”周作人称顶真儿歌为“趁韵歌”，赵霞的《高铁高》属这类：“高铁高，走大桥，大桥宽，走平川，平川阔，走沙坡，沙波黄，走长江，长江远，走山脉，山脉弯，走高原，高原高处云连天，高铁开向云里边。”“趁韵歌”里可以有跳跃性思维，可以“无厘头”，赵霞写得却很规整，大桥、平川、沙坡、长江、山脉、高原，各种地理形态都表达了。作者在不同儿歌中做了声韵的探索。如《元宵》：“大汤圆，小汤圆，团团圆圆。／小汤圆，大汤圆，一碗团团。”上阙与下阙，“大”跟“小”倒用，最后一句“团团”与“一碗”又前后倒置。这种实验，建立在与孩子吟诵时不断地切磋琢磨之上。

书名《北斗在天》选自其中的一首儿歌，可称是全书的代表作。“北斗在天，星星点点，上下照耀，无边无际。／北斗在地，点点星星，上下耀

照，无边无际。”这首儿歌，气象开阔，既是古典的意象“北斗星”，又可寓意今天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北斗在天”既是起兴，又是实指。而“北斗在地”“点点星星”等互文，在汉字的重叠、反复中有意象和音韵的巧妙转化，前后照应，一唱三叹。

童谣和儿歌是人类精神生活的活化石，犹如自然生长的野花，开在原野里，并不引人注目。相较于儿童小说、童话等文体，学界对童谣儿歌重视程度并不高。当前，由于对儿歌的提倡，整理和创作者多起来了，但好作品并不多。《北斗在天》是其中颇具特色的一部，赵霞在儿歌文字音韵的“童言”磨炼方面下足了功夫，展现了儿歌艺术的魅力。如果能增加一点狂野、奔放的“无忌”色彩，作品会更具生命力。因为对于儿童来说，天真无邪的感悟、无拘无束的想象、率真稚拙的语言、“无厘头”的游戏精神，这是不同于成人世界的另一片广阔天地。

（作者单位：浙江出版联合集团）